

100年前,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农村蕴藏着挽救中国的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成功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人类减贫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壮举。近6年,我走遍了全国多省区的数百个村寨,越来越感到,千条经验万条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党的领导,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

回顾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建在连上的党支部,二是建在村里的党支部。

“党支部建在村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党支部在把农民组织起来,投身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行,几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秋梦想。然而各自耕种的生产方式还是小农经济。中国共产党发挥农村支部的作用,号召“组织起来搞生产”,劳力少、缺生产资料的农民耕种有困难,贫弱联合的“互助组”就出现了。在此基础上,农业合作社应运而生,直至全国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干出来的。“十年九旱”曾经写满历朝历代的史志,一个坦露在土地上的原因是:“小农经济”状态下耕种的土地缺少统一的灌溉设施。改造它,这是几千年的土地留给新中国农民的一个历史性任务。

乡村巨变的世纪回响

□ 王宏甲

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农民投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河南林县红旗渠,开工前夜是1960年的2月10日晚,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发出《引漳入林动员令》。第二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全县首批37000多农民,一大早就从15个公社的各个村庄自带工具和行李向修渠工地会集。如果没有“组织起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贵州毕节的“绝壁天渠”,是个比红旗渠更早的悬崖水利工程,在高原默默流淌了半个多世纪。从1956年至1980年,毕节县农民在悬崖绝壁上修通了40多条天渠,构成了一幅逶迤奔流的高原天河图。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就不会有流淌至今的毕节天渠。林县红旗渠与毕节天渠,都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典型。

宏伟的农业基础工程保障了农业稳定丰收,显著增产,为发展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创造了必要条件,并为支持国家发展工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农民的贡献是巨大的!改革开放年代,深圳“犹如一夜之间从海底升起的城市”,在这惊人的成就里不能忘记“百万劳工下深圳”。不仅是深圳,中国所有新兴城市的兴起和繁荣,所有城市的高楼大厦、立交桥,通往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高铁,其主要劳动力是农民工。当世界看到中国诸多繁华的城市拔地而起,不能忘记,亿万农民工也在中国辉煌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铁匠乡共同村已脱贫妇女李飞燕同扶贫干部告别

的形象里。

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农民生活。以贵州为例,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如今贵州省高速公路通达每一个县,也就是到每个县都如履平地。每个县都有硬面的通村路通组路,贵州宣称“进入平原时代”。正是全国城乡人民的合力发展,我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

再看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曾引用东汉史学家荀悦的“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之说。多年来我在乡村调研采访一再体会到,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正是在农村贫困人口最贫寒的地方,以举国之力去温暖共和国的肌体末梢。

千百年来谁见过农民有档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精准扶贫,2014年识别出贫困人口8962万人,全部建档立卡。后两年,经过精准扶贫“回头看”,贫困识别准确率提升,建档贫困人口达到9899万人,比初次建档还多

《1921》:生动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先驱

□ 张丹丹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拍摄的影片《1921》已于7月1日正式上映,到7月8日为止取得了3.57亿的票房收入,可以称得上是“叫好又叫座”。该片以1921年的上海为背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的历史事件,刻画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党员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虽然各有特点,甚至后来各有选择,但《1921》中的这些革命者集中地体现了三个特征:可信、可爱、可敬。

可信

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里,世界正在发生巨变,而中国正处在外有强敌觊觎、内有军阀混战、民生一片凋敝的严重困局中。电影片头用黑白画面回顾了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种种遭遇,正是在这种内忧外困的形势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国家的出路,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改变命运的关键。

深挖历史,才能重现历史。《1921》里有很多触动人心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是建构于历史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1921》的剧本创作前后花费3年半时间,在参考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找到了讲述建党故事的新角度,那就是以1921年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一时间、地点、事件相对集中的横截面来建构故事。用导演黄建新的话来说就是:用电影本身的叙述方式去完成一部电影。“电影是由各种点点滴滴的细节堆出来的。”人物形象的可信也是建立在细节的处理基础上,《1921》中有一场李达的重头戏——李达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谈判不顺利,回到家中,他在天台上和妻子王会悟进行了一番对话,提到了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他说到自己参与抵制日货时,当划下火柴准备焚烧日货时,却发现连火柴都是日本制造的,瞬间就崩溃了。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1921》专家研讨会暨首映礼上,导演黄建新讲到该片点映时,现场一个小朋友看完电影说:“一百年前我们没有自己的火柴,但是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火箭”。在电影中有这样一幕,李达冒着被日本特



工跟踪、暴露的危险,一路跑到印刷厂,就是要在出版物付印前,把“百姓”改成“人民”。他向印刷工人解释,是自己翻译错了,“百姓是泛指,人民是主人。”在这段故事情节里,对两个名词的不同理解,恰恰说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1921》编剧余曦对影片诸多史料细节设计幕后的含义解释为:希望影片能阐释出当时尝试过这么多道路以后,只有选择一条新路,就是选择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可爱

1915年,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热情洋溢地赞美青年:“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这些年轻人,他们各有各的喜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更有坚定的信仰。正是“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

通过查阅史料,《1921》的主创团队发现毛泽东当年在上海,起初是在洗衣房打工,电影里毛泽东一出场就是在洗衣房里,有观众评论说:这就和现在的大学生勤工俭学似的,一下子和年轻观众产生了亲近感。再比如毛泽东和李达是湖南老乡,到上海后,李达就请他吃饭。李达胃不好,不能吃辣,饭桌上一个辣菜都没有,毛泽东就用湖南方言调侃他“湖南完咯”。李达还企图借王会悟当借口,结

果王会悟说:我敢吃辣。这些细节都使得李达和毛泽东的形象十分可爱。虽然时代不同了,我们和当年的革命者境遇已经完全不同,但是这些生活上的细节让我们和他们有了“链接”,革命者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他们也有喜怒哀乐,《1921》表现出了人性真实的一面,也就展现出了可爱。1948年,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一封信中写道: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影片用一场饭桌上的戏,回溯了两人合伙创业搞革命的起点,把这段历史变得更加有趣。这些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革命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感,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革命者的思想和行动。

可敬

电影中杨开慧和毛泽东有一段对话,杨开慧问毛泽东:人生好短,短到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那么今天的付出还有意义吗?毛泽东回答:当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即便是一无所获,也值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与片头形成鲜明对比,片尾从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欢呼的人群开始,随后出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重大历史节点,无数先烈在炮火硝烟中前赴后继。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奋斗和牺牲不是为了自己,是为

了别人,是为了更多的人。他们奋斗的目标如今已经实现,今天的我们能够体会他们牺牲的价值。

李大钊牺牲的时候,当时的报纸记载,他淡淡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更让人动容的是李大钊牺牲之后,他的妻子赵纫兰女士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丈夫安葬了,但是她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处,就是家里面连买口棺材的钱都没有,赵纫兰花了5年的时间,才筹足了一口棺材的钱,把自己的丈夫埋在万安公墓。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可敬的人,我们的国家才能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发展到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强调,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改革开放以来,影视作品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导演黄建新所言:用《1921》作为片名,是想让建党这一开天辟地的伟大实践,跟整个世界产生更加深广的关联。视野更开阔,也更具国际化,片名都不需要翻译。这种国际化表述,是想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921年的这些人既有革命的理想、生命的光彩,又有性格的魅力、灵魂的丰赡,他们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几千年了,打动我们情感的力量基本没有改变,电影《1921》用镜头语言找到了这种打动人心的力量。电影是一扇窗,可以激发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作为出品方之一,推出了《1921》这部电影,给目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好素材,《1921》也许无法穷尽建党历程背后的细节,但可以成为观众们深入这段历史的起点,激励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还债』汪曾祺

□ 王 干

5月22日上午在江苏高邮汪曾祺纪念馆举办的《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的首发式上,汪曾祺之子汪朗发言说道,王干这本书是带着感情写的,也是“还债”,他吃了我们家老头儿做的那么多饭,现在所做的都是还饭钱。话自然是带着玩笑说的,但也是实情。

1988年,我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周末常到汪先生家里去蹭饭,当然更愿意的是和他闲聊。这种闲聊,有时候比读书听课更容易获取营养,因而在汪家蹭饭,获取的是双重营养。当然,汪先生是美食家,厨艺也是了得。一般人能够吃到他的一顿菜肴,就可以炫耀了,而我被汪家称为“吃老头儿做饭最多”的客人,自然是很幸运也是很自豪的事情。

至于我是否有意识地“还债”,我说不清楚,感恩之心是常有,最关键的还是热爱。热爱汪曾祺的作品,热爱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热爱汪曾祺本人,愿意把这种热爱与人分享,就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结集成书,也是对汪老的怀念和感激吧。

如果说“还债”,我的这些文字或者还不够格,如果没有误解或者误读汪先生的作品,就很满足了,“修辞立其诚”,就像汪朗说的那样,这些文字是带着感情写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恩。

如果说“还”的话,我最近捐赠的一份汪先生赐予我的“大礼”,算是物归原主。现在在汪曾祺渐渐热起来,我捐出来,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汪迷能够分享到汪先生的“小温”。

我在首发式上捐出了1985年汪先生为我的小说《除夕》修改的原稿。当时我迷恋汪先生的小说,就暗暗模仿,在1984年的《扬州日报》上发表过《瓜王走麦城》,还获得了该报国庆35周年的征文奖,这是我第一次获得文学奖。当时有人称我的小说有汪味,我有了信心,写了这篇《除夕》寄给汪先生。没想到汪先生认真看了,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认真批改了。有眉批,也有总批,个别错别字也指出来。之后,我根据汪先生的意见,对小说做了认真修改,改名为《除夕·初一》投给《安徽文学》,很快收到录用通知。当时的《安徽文学》的主编江流先生是江苏东台人,非常喜欢汪先生的作品,

对我笔下的人物风俗感到很亲切,为我这样一个无名作者提供版面。

虽然我后来被文学评论所裹挟,放弃了小说创作,但汪先生对一个文学晚辈的鼓励,尤其对我小说提的那些具体的意见,我不能一个人“私吞”了,这些宝贵的意见对文学爱好者还是很有帮助的。有些话,当时我看不明白。比如,他批改道,“前面太散”,您老人家不是喜欢散吗?还批评我“散”,当时不太理解,也不太服气。现在明白了,前面真的很散,在相互之间没有魂“勾”着。这些对于初学写小说的人来说,尤为值得借鉴。我现在把手稿捐出来,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到接触到汪先生带体温的文字。

手稿捐给汪曾祺纪念馆,也是最好的去处,是“还”给汪先生,也是还给高邮。

(2021年5月27日于高铁途中)